

專輯論文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陳憶寧

摘要

本研究探討以美國牛肉進口台灣作為風險議題，台灣民眾的媒介使用與狂牛症相關之風險知識、感知、態度與行為改變的關係。本研究於2010年1月完成的1,079位台灣民眾電話調查當中發現，政治信任可以顯著預測擔心程度、風險態度與行為改變。政治信任度越低，越容易擔心風險無法避免，也認為須要少吃牛肉。民眾最常得到有關美國牛肉議題的資訊管道為電視新聞。電視新聞使用時間與風險知識有正向關係，但看電視新聞時間越長越會覺得擔心。而對報紙新聞的注意程度有助於知識增加，也會產生消費行為改變。本文最後討論為何電視與報紙新聞會在風險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上產生效果上的差異。

關鍵詞：狂牛症、美國牛肉進口、政治信任、風險感知、媒介使用

陳憶寧，台灣政治大學廣告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媒介效果(健康與風險傳播、政治傳播)、科學傳播、公共關係。電郵：kynchen@nccu.edu.tw

Special Issue Artic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edia Use, Political Trust, and Risk Perception during the U.S. Beef Imports Crisis in Taiwan

Yi-Ning Katherine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media affected risk perception, attitudes toward risk, and behavior change as related to mad cow disease during the crisis of lifting the ban on U.S. beef importing to Taiwan. We conducted an island-wide survey of 1,079 residents in Taiwan in January 2010. Results showed that political trust mostly determined people's cogni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oward the risk. People with lower political trust tended to worry more about the risk, considered the risk unavoidable, and tended to eat less beef. People received most of their information about risk from television news, and time spent watching television news wa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risk knowledge. However, while attention to newspaper news helped individuals gain knowledge and was likely to change beef consumption, attention to television news did not predict knowledge. Instead, it increased worry. This implies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between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 news, which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mad cow disease, media use, political trust, risk perception, U.S. beef import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 Y. N. K. (201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edia Use, Political Trust, and Risk Perception during the U.S. Beef Imports Crisis in Taiwa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31–60.

Yi-Ning Katherine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dia effects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2003年12月23日，美國證實出現首宗狂牛症病例後，與美國向來貿易往來密切的台灣，即刻作出反應。農委會隨即公告美國為狂牛症疫區，衛生署亦於同日禁止美國牛肉輸入台灣。2005年4月16日起，台灣首度有條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2008年美國政府積極與我方進行美國牛肉的貿易談判，歷經17個月的交涉後，於2009年10月22日台美簽署美國牛肉輸台議定書，美國牛內臟與牛絞肉確定進口台灣。消息一出，引發國內專家學者和輿論反彈，¹民進黨民調中心於事件發生一週內完成的民調顯示，高達72%的民眾認為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幅度過大；有71%的民眾對於政府宣稱將嚴格管制牛肉產品進口的保證不具信心；高達82%的民眾認為應該針對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決策，與美國重啟談判。不論泛藍或是泛綠支持者均有八成以上認為應該重新談判，中間選民亦有79%贊成重啟談判，故「重啟談判」為社會絕大多數民眾不分黨派的共識（民進黨民意調查中心，2009）。²

在各方劇烈反彈下，政府決定施行「三管五卡」政策，不過，進口美國牛肉仍然引起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的強烈反彈，政府的表現也未能即刻化解各方疑慮，其中尤以總統與衛生署長的表現為最。³在2009年的10月到12月，美國牛肉議題成為台灣地區的輿論焦點，新聞媒體不僅報導政府措施以及立法院所進行的討論，也反映民眾對於政府的各項措施的看法。根據2010年1月4日台灣的電視台TVBS所執行的民調顯示，64%民眾支持立法院修法禁止美國牛內臟以及絞肉進口，且民進黨支持者中有78%，國民黨支持者則有66%支持修法。另外，高達67%的民眾認為即使影響台美關係，也應禁止美牛內臟與絞肉進口（TVBS民意調查中心，2010）。⁴由以上事件發展歷程來看，可以看出美國牛肉議題在台灣所造成的社會震撼。台灣對於美國牛肉的激烈反應不難理解，多年來媒體對幾起病例報導，使得民眾將罹患狂牛症連結為食用疫區牛肉的可能後果之一。

在過去有關危機的文獻中，牛海綿狀腦病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 危機，俗稱狂牛症 (mad cow diseases) 常成為「風險的社會擴大效應」(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教科書上的範例。一如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Kasperson、Jhaveri和Kasperson(2001, p. 9)所言，狂牛症是典型的特殊風險類型。在專家認定風險之後，狂牛症引發密集的媒體報導、公眾的強烈關心、政治與社會組織的高度注意，其社會影響不僅僅限於疾病本身，還有後續複雜的效應，例如政治考量所引發的輿論與決策過程(此即所謂的「風險的社會擴大效應」)，過去在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都產生因狂牛症而產生的風險擴大現象。

風險的擴大效應也可以發生於個人層次。當風險議題被引發後，個人對風險也產生不同程度的感知。當中媒介報導、民眾知識、對社會與政治機構的信任對於引發擴大效果均有所影響。其中，常常被提出討論的是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對學者專家的可信度亦是重要因素(Lews & Tyshenko, 2009)。

狂牛症風險中存在幾個產生高度危機的重要影響因素。狂牛症是一個偶然的、新的、高度不確定的、且有可能致人於死的風險，民眾都可能暴露其中。眾所周知暴露的來源是牛肉與牛肉相關製品，而在防範時為降低風險，會採用兩種手段：一是根據已知的科學知識與相關防禦辦法，採取公共健康的措施，例如政府的三管五卡；二是個人可藉由修正飲食習慣，意即減少或完全不購買牛肉與牛肉製品，來降低感染狂牛症的機率。

因為媒體大幅報導，美國牛肉議題與相關資訊於台灣已家喻戶曉，媒體報導的效果不可忽略。過去媒介效果研究一向聚焦於媒介內容對民眾社會的、心理的、行為的影響(Bryanty & Zillmann, 2002)。由於民眾藉由媒體報導才得知該項議題，所以對於美國牛肉風險認知應與新聞媒體之使用有所關聯。Reilly(1999)的研究發現狂牛症的新聞報導影響了民眾。他以焦點訪談法探索人們在接觸相關新聞時對該事件的看法，發現大多數人認為狂牛症是個真正的風險議題，並且產生態度與消費行為的影響。為了解媒體對台灣民眾的影響，本研究於2010年初在美國牛肉進口爭議事件接近尾聲時，調查台灣民眾的媒介使用與對該議題之風險認知、態度以及行為影響，以了解影響狂牛症風險感知的媒介使用因素。

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對風險管理決策者而言是重要的參考依據(Krewski et al., 1987; Krewski, 1993; Slovic, 1999)。根據Fischhoff、Slovic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和Lichtenstein (1978) 指出，一般民眾不見得有機會直接經驗到風險本身，而多半依賴媒體告知。所以民眾的風險感知多少會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例如媒體報導影響了民眾對風險的了解程度、不確定感、恐懼程度等。但必須注意的是，因為媒體報導不能完全反映真實，因此，可以推論民眾對風險的觀點也可能與風險的實際狀況有落差。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媒體使用與風險認知。民主社會中的閱聽大眾對社會重要的風險議題應有認知，然而新聞媒體的使用是否有助，抑或是有害於民眾對風險的認知與處理之態度與行為？本研究在媒體使用上分為兩個層次，第一為暴露，第二為注意程度。另外，由於台灣的美國牛肉議題在開放進口的層面上，發展為政治議題，藍綠之間劍拔弩張。台灣在兩黨互不信任的氛圍中，風險議題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因此本研究一併探討政治信任與民眾的風險認知、態度與行為的關係。

文獻探討

新聞中的風險

知識社會學者Hansson (2002) 認為「風險」概念包含了三個面向：第一，「風險」指涉人們不能確定某一不受歡迎事物的發生與否；第二，在某些情況下「風險」所指的是不受歡迎事物發生之機率 (probability)；第三，「風險」通常指稱估計不受歡迎事物或行動發生之機率乘上其嚴重程度，例如核能發電出錯的機率低，但一旦出事，則危害甚鉅，所以風險高。以上可歸結，風險包括災害 (hazards) 於未來發生的可能性、包含不確定性，且涉及人在各種理性計算與考量後的行為決策。

俗稱狂牛症的牛海綿狀腦病，在世界各個地區發生時都是該地的風險危機案例。它會引發公眾的強烈關心、各類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的高度注意，以及大幅的媒體報導。狂牛症的風險中包含了被界定為高度危機風險的重要因素：它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有可能致人於死的風險，且該地區民眾都可能暴露在其中。美國是狂牛症之疫區，台灣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府在進口疫區牛肉是否有特殊考量，並非本文討論重點，然該風險一旦發生之負面效果顯然難以承受。

根據過去發生案例，一旦某一地區被懷疑有此疾病感染風險，媒體在散佈相關資訊上必然是重要角色(Wilson, Code, Dornan, Ahmad, Hebert, & Graham, 2004)。然而，媒體對於發生的各種風險議題並非完全反映現實。Kizinger和Reilly(1997)探討媒體為何會挑選或拋棄某些特定風險議題，發現媒體並非被所有風險吸引，影響新聞媒體對風險的關注因素包括：(1)「新聞記者的知識程度」，有些記者會避開對他們而言不容易理解的議題；(2)「新聞價值」高低；(3)「接近性」，亦即風險可能會發生你我及任何人身上；(4)「同儕參照的媒體力量」，當故事變得有新聞價值，其他媒體也會跟進報導；(5)施壓團體、職業團體、政治人物等的相關反應。有學者指出，大眾媒體常被指控為偏見、渲染、不精確、冷漠以及過於極端，媒體對閱聽大眾傳播風險概念的層面做得太差(Dunwoody & Ryan, 1985)。過去研究結果發現，媒體對風險的報導並未真切的反映事實(Combs & Slovic, 1979; Greenberg, Sachsman, Sandman, & Salomone, 1989)，風險新聞只報導事件，幾乎沒有風險資訊或知識(Sandman, Sachsman, Greenberg, & Gochfeld, 1987; Singer & Endreny, 1987)。Greenberg等人(1989)的研究發現，對電視台的新聞從業人員而言，事件是否具新聞性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而風險的重要性則是其次。同樣的，Singer和Endreny(1987)也提到在他們研究的15個媒體中，發現媒體報導風險新聞與否，取決於新聞記者自己的判斷。新聞記者經常報導風險，卻缺乏對風險的解釋，也常忽略解釋風險的原因。研究者認為，記者沒有認知到事件中的風險，因此報導中不具任何風險特質的訊息。當風險報導要被框架成風險新聞時，記者需要相當的專業素養才得以妥適地描述風險訊息。

McComas(2006)檢視風險傳播相關研究時，指出新聞往往缺乏可幫助閱聽眾評估風險的重要資訊。Rowe、Frewer和Sjoberg(2000)比較英國和瑞典的報紙對車諾比事件的風險報導特點，發現相關報導很少使用能幫助人們了解風險的統計資料和數據比較，且報導中的負面語氣多於正面。Frost、Frank和Maibach(1997)研究媒體報導死亡的原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因，發現媒體報導中較少呈現慢性的傷害，如吸煙和心臟病的報導，但過度報導其他死亡原因，如由車禍或有毒藥物，這樣的比例和實際的情形不同。Dudo、Dahlstrom和Brossard (2007)以五個面向檢視四家美國主要報紙有關禽流感的報導品質，包括風險程度、風險比較、自我效能、聳動題材和主題，以及新聞框架。研究結果發現報導多為個人故事性的情節(episodic)框架；內容偏向聳動，而且沒有太多可提升民眾自我效能的資訊。新聞內容呈現禽流感的高風險，例如清楚地指出其遠高於其他流感等風險的機率。總而言之，禽流感的風險被高估，但對於民眾面對禽流感恐慌的幫助卻有限。

過去有關健康與醫療議題的新聞相關研究，較常關注新聞的正確性，例如生病與死亡的統計數字，或是專業術語的正確運用等。其關切的出發點在於新聞當中不夠正確的資訊會引起閱聽人的誤會，甚至傷害。所謂的不正確指控往往來自於專家及科學家，假設了媒體正確的報導有益於閱聽人的生活品質。然而，以傳播學的觀點而言，媒體就算正確地報導單一短期事件，不見得反映長期客觀的真實，例如刺激感官程度較高的事件往往得到媒體較大的關注。又比方因癌症而死亡的案例，就比因氣喘、糖尿病與心臟病等所謂寧靜殺手而死亡的案例，容易獲得媒體大幅報導(Lichtenstein, 1978)。研究民眾風險感知的學者Singer和Endreny (1987)蒐集美國電視和報紙從1960到1984年之間的報導，研究發現媒體關注事件的程度和因事件而死亡的人數無關(1987: 14)，因此可以推論，媒體並不根據風險(risks)大小而報導，媒體是根據所猜測的損害(harms)程度而報導(Singer & Endreny, 1987: 14)，也就是說新聞媒體強調的是事件的負面程度以及戲劇化。媒體被賦予傳達現代生活中風險的任務，若報導中過度強調損害可能會造成閱聽人的不安，甚至恐懼，雖有利於刺激收視，但媒體恐無意識地一步步朝向成為製造社會不安的角色，使得閱聽人越接觸媒介，越覺得世界危險。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風險新聞對民眾的影響

大眾媒體提供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資訊，也提供了生存上所需的安全感與信任 (Giddens, 1990, 1991)，而當風險時也理當扮演引導民眾處風險的重要輔助角色 (Beck, 1999；顧忠華，2001, 2003)。媒體之重要性在於充滿不確定的風險社會中，幾乎是民眾主要的資訊來源，風險溝通不可忽視因為媒體是傳遞訊息、影響社會大眾感知的重要管道 (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Verbeke、Viaene和Guiot (1999) 研究比利時的大眾媒體報導肉類資訊，對於消費者感知、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現大眾媒體有時候比人際間的傳播更能影響人們對風險感知，尤其當媒體報導量大時，影響程度更大。

Morton與Duck (2001) 研究媒體報導對皮膚癌的健康議題風險判斷的影響，發現較依賴媒體為健康資訊來源的人，傾向將媒體上的風險資訊和自己的健康風險相連結。Berry、Higgins和Naylor (2007) 指出，SARS期間，媒體使得個人高估SARS風險，而低估其他的風險，媒體不僅影響風險認知，甚至影響了健康行為的決策。Neuwirth、Dunwoody和Griffin (2000) 以保護動機理論探討媒體報導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媒體呈現風險越嚴重，個人就越傾向尋求訊息，並願意採取保護自己的行動。新聞中呈現的風險程度高低，和個人可採取的行動選項，也影響個人是否願意採取保護行動。總而言之，新聞的確影響民眾對風險的感知、態度及行為。Corbett和Mori (1999) 研究發現醫藥社群會主動透過媒體設定議題，因而造成一般民眾注意特定醫藥議題。例如醫藥社群呼籲注意乳癌，媒體因此報導乳癌，而之後民眾檢查乳房的頻次就因此增加。以上研究均說明了在健康議題上，媒體報導影響了民眾對健康資訊的認知、態度與行為。

信任感對風險感知的影響

信任是對於他人的正面認知偏差 (Cook & Cooper, 2001)，或可說是對於他人行為上的正面期待 (Anderson, 1996; Hardin, 2001; Yamagushi & Yamagushi, 1994)。信任關係發生的基本前提是，情景具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有不確定性以及無法預測的特性，亦即因此無法確定對方的反應，而自己又處於潛在受損的劣勢下，仍相信對方會有自己預期的正向作為 (Mcknight, Cummings, & Chervany, 1998)。廣泛地說，信任是個人對於他人有正面意圖的信念，也就是相信對方不會意圖傷害自己、會尊重自己的權益、會履行責任與義務 (Yamagushi & Yamagushi, 1994)，信任會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Rotter, 1971)，所以對於社會運作而言，是心理上的潤滑劑。至於不信任，乃是對於對方有負面的期待，認為對方可能會傷害自己。在政治的範疇中，所謂的政治信任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也是政治體制順利運作的重要保障，不論是危機或是非危機時期皆是如此，然而，危機時期的信任更形重要。在此所討論的「政治信任」指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faith)：若民眾認為政府效率不彰或對政府所作所為缺乏信心，就易產生政治不信任感 (Citrin & Muste, 1999)，賦予政府的執政自由就會縮小，且會處處設法限制政府，以確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反之，當民眾對政府有相當程度的信任時，則傾向相信政府為人民謀福利並遵守法律，也可能使民眾支持國政支出 (Chanley, 2002)，並誠實納稅 (Scholz & Lubell, 1998)。政治信任低落導致民眾對國家政策不滿，影響民主政體的生存。Cappella與Jamieson (1997: 142) 認為，政治信任意謂着人民認為「政治領袖會採取可能的行動來維護大眾的利益，而非其個人的利益」。當民眾對於政治權威具有相當程度的信任時，民眾相信當局會遵守法律並為人民謀福利；相對地，當政治權威當局的行為不是以民眾為依歸，而是圖個人之利益時，民眾自然會對於政府產生懷疑 (Dennis and Webster, 1975)。

根據Slovic (1999)，要達到有效的風險傳播必須考量其局限，所謂的局限常指公眾對於有關單位缺乏信任。民眾對機構的信賴是種意願，指願意信賴那些與科技、環境管理有關，或其他公共健康安全領域負有決策和行動責任的人士。意願有高有低，造成信任也有不同程度。信任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元素：依賴 (reliance) 和風險 (risk)。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科學和科技知識以判別風險和利益，因此必須仰賴專家提供的資訊，以專家的評估和判斷為準。民眾對於自我在控制風險能力缺乏導致人們的個人效能感偏低，讓個人感到無助，因而更仰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管理機構。若不能信任機構，則無法面對風險產生正向的態度與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美國牛肉進口議題上，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會影響個人對於風險的反應。由以上討論可以推論，個人的政治信任程度可能影響到對於政府進口美國牛肉事件當中的風險判斷。政治信任程度高者，認為政府在牛肉進口事件當中會保障民眾的權益，會盡力提供完整資訊，所以對於美國牛肉的風險較不擔心，且較不會影響到牛肉的消費習慣。

其他風險感知影響因素

狂牛症的風險心理相關研究將風險認知定義為「人們對於威脅的認知及情感反應」(Setbon, Raude, Fischler, & Flahault, 2005)。這個定義結合了情感性的成分(例如恐懼或擔憂)，及發生或然率的成分(主觀的風險評估)，足以呈現健康風險認知的內涵。在風險傳播的脈絡下，大眾傳播媒介對於形成對風險的感知有一定影響，亦即，媒介暴露與注意可能形成民眾對議題的認知與態度。除此之外，Macintyre等人(1998)採用團體研究，試圖找出在媒體報導和食物選擇上，究竟還有哪些影響因素。他們發現受訪者的飲食習慣和年齡、性別、收入、個人經驗、國家認同等都相關，而且受訪者對沙門氏菌、李斯特菌、狂牛症和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知識都是從媒體而來。不過這些受訪者也表現出對官方建議、政治人物聲明、科學家、專家和媒體等的懷疑態度。因此本研究探討媒體的風險新聞效果，將納入個人於進口牛肉風險中對於政府、學者專家以及其他機構的信任。

此外，人際傳播的力量亦不可忽視。早期的媒介依賴理論認為媒介內容提供人們進行討論的資料(Rokeach & Defleur, 1976)，例如媒介提供政治議題，刺激人們進行相關討論(Lenart, 1994)。Chaffee(1986)指出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對人們的判斷有互補作用，並不認為人際傳播比起大眾媒介特別有說服效果。在風險傳播的研究當中，同時將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比較的研究並不多見，Mazur與Hall(1990)發現家庭成員之間的人際傳播影響力相當大，Dunwoody與Neuwirth(1991)以大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學生為例，發現學生吸收有關愛滋病的風險資訊時，是運用了大眾媒介以及人際傳播兩種管道，但是兩種管道對於風險判斷的功能不同，前者僅有認知功能，後者除認知之外，另有情感功能。Coleman (1993) 以媒介暴露和人際傳播作為自變項，探討兩者對各種風險判斷的影響，風險項目包括心臟病、愛滋、抽煙、放射污染、水污染、氫氣、化學食品和家用清潔劑等。他的研究發現大眾媒體與人際傳播都會影響到風險判斷，但人際傳播主要影響為在社會層次的風險判斷，而大眾媒介則是社會與個人風險都有影響。

由以上討論，本研究發展出以下的研究假設與問題：

研究問題一：民眾在美國牛肉議題上對於各機構的信任程度如何？

研究假設一：民眾的政治信任程度負面預測美國牛肉的風險認知、態度與行為改變。

研究問題二：民眾的個人特質、媒介暴露、媒介注意和對美國牛肉風險的知識、認知、態度與行為改變之關係為何？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針對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的電話調查，目的在於探討民眾的媒體使用以及對於美國牛肉風險認知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基於研究目的，將母體範圍訂為台灣地區民眾（不含金門、馬祖與澎湖）。在調查執行上，委託台北私人市調公司採取電腦輔助電話號碼的隨機抽樣訪問(CATI,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電話接聽後，採戶中抽樣，以台灣地區年滿20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為主。本次電話調查的執行時間為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至2010年1月1日(星期五)之間總共五天，成功訪問1,079人，訪問成功率為21.3%。本研究的成功樣本與根據內政部98年出版之《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的母體資料在年齡、教育程度與地區方面有不一致的現象。為避免資料分析時造成推論的偏差，本研究決定針對每一樣本，特以「多變數反覆加權」(raking)方式進行成功樣本統計加權。經過加權處理後，顯示成功樣本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地區的分佈上，均與母體分佈無差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受訪者中，男性有538人(佔49.9%)，女性541人(佔50.1%)；年齡在20至29歲者有219人(20.3%)，30至39歲者228人(21.2%)，在40至49歲者231人(21.5%)，在50至59歲者194人(18.1%)，60至69歲者100人(9.3%)，70歲及以上104人(9.6%)；教育程度不識字及未入學者30人(2.8%)，國小者177人(16.5%)，國中程度有154人(14.4%)，高中程度有317人(29.6%)，專科程度有146人(13.6%)，大學程度有199人(18.5%)，研究所及以上有48人(4.5%)。

變項測量：

問卷當中含有七個面向，分別包含媒介使用、資訊管道、對狂牛症的認知風險、個人的狂牛症知識與感染狂牛症的風險、政治信任、社會信任、狂牛症相關風險的態度，以及牛肉消費行為的改變。

(1) 媒介使用：媒體之使用上，變項包括：

A. 新聞暴露：題項為

- (a) 請問您每天平均看報紙新聞的時間大約多久？
- (b) 請問您每天平均看電視新聞的時間大約多久？
- (c) 請問您每天平均看網絡新聞的時間大約多久？

以上三題的選項從「1=幾乎不看」、「2=15分鐘以下」、「3=16至30分鐘」、「4=31至45分鐘」、「5=46分鐘至1小時」到「6=1小時以上〔不含1小時〕」。

B. 新聞注意：題項為Likert五點量表由「1=非常不同意」、「2=有些不同意」、「3=普通」、「4=有點同意」、「5=非常同意」的三種主要新聞媒體的問題。

(a) 最近您一直注意報紙上有關美國牛肉的新聞報導。請問您同意我這樣說嗎？

(b) 最近您一直注意電視上有關美國牛肉的新聞報導。請問您同意我這樣說嗎？

(c) 最近您一直注意網絡上有關美國牛肉的新聞報導。請問您同意我這樣說嗎？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C. 資訊來源：題項為「請問您最常從哪裡得到有關美國牛肉的消息？分為報紙新聞、電視新聞、網絡、雜誌、廣播、與別人交談中」。

D. 網絡搜尋：題項為 Likert 五點量表詢問同意程度的「您會上網搜尋美國牛肉的相關資訊，請問您同意我這樣說嗎？」

E. 人際討論：題項為 Likert 五點量表詢問同意程度的「最近您常常和別人討論有關美國牛肉的新聞。請問您同意我這樣說嗎？」

(2) 風險認知題項：

本研究將風險感知定義為個人的擔心程度。對於狂牛症的擔心程度則是以五點量表回答「請問您認為吃美國牛肉有沒有可能對健康造成傷害？」，受訪者回應從「1=非常不可能」、「2=不可能」、「3=普通」、「4=可能」到「5=非常可能」；「請問您會不會擔心吃美國牛肉有風險？」，受訪者回應從「1=非常不擔心」、「2=不擔心」、「3=普通」、「4=擔心」到「5=非常擔心」；「請問您認為目前吃美國牛肉安不安全？」，受訪者回應從「1=非常不安全」、「2=不安全」、「3=普通」、「4=安全」到「5=非常安全」；「請問您認為吃美國牛肉對健康的威脅嚴不嚴重？」，受訪者回應從「1=非常不嚴重」、「2=有些不嚴重」、「3=普通」、「4=有點嚴重」到「5=非常嚴重」；以及「請問您認為您對美國牛肉的安全性可不可以自己掌控？」，受訪者回應從「1=非常不能掌控」、「2=不能掌控」、「3=普通」、「4=可以掌控」到「5=非常可以掌控」。其中詢問吃美國牛肉安不安全以及擔不擔心兩題進行反轉，而與其他三題呈現一致的方向，也就是分數越高，擔心程度越高。經主成分因素分析後，5個題項呈現一個因素（面向），共可解釋 64.91% 的變異量，特徵值=3.25（見表一），信度檢測 Cronbach's $\alpha = .84$ 。五個題項均與擔心有關，因此命名為「擔心程度」。建構擔心程度變項的方法是將這 5 個題項加起來除以 5；得分越高表示擔心程度越高（平均數 = 3.55，標準差 = 1.0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表一：擔心程度題項之主成分因素分析(最大變異法)

題項	因素 擔心程度
吃美國牛肉對健康的威脅嚴不嚴重？	.89
擔心吃美國牛肉有風險？	.88
吃美國牛肉安不安全？	.88
吃美國牛肉有沒有可能對健康造成傷害？	.86
對美國牛肉的安全性可不可以自己掌控？	.42
特徵值 (Eigenvalue)	3.25
解釋變異量	64.91
Cronbach's α	.84

(3) 對於狂牛症的態度：

題項為 Likert 五點量表詢問同意程度的「有人說『只要小心一點，就可以避開狂牛症的侵襲』。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有人說『對自己最好的保護就是不吃牛肉』。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有人說『我們對狂牛症所知有限，所以少吃美國牛肉為妙』。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受訪者回答從「1=非常不同意」、「2=有些不同意」、「3=普通」、「4=有點同意」到「5=非常同意」。其中詢問「只要小心一點，就可以避開狂牛症的侵襲」一題進行反轉，而與其他兩題呈現一致的方向，也就是分數越高，對狂牛症越是謹慎。對於狂牛症的態度3題詢問同意程度的題項經主成分因素分析後，發現這3個題項呈現兩個因素(面向)，其中「有人說『只要小心一點，就可以避開狂牛症的侵襲』。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單獨成為一個因素，故刪除本題項，將另兩個題項分別為「有人說『對自己最好的保護就是不吃牛肉』。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有人說『我們對狂牛症所知有限，所以少吃美國牛肉為妙』。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再度進行因素分析後，共可解釋72.62%的變異量，特徵值=1.45，信度檢測 Pearson 相關分析 $r = .45$ ($p < .001$)。兩個題項為對美國牛肉導致狂牛病風險的態度，因此命名為「風險程度」。建構風險程度變項的方法是將這2個題項加起來除以2；得分越高表示風險態度越保守(平均數=3.75，標準差=1.34)。

(4) 對於消費牛肉行為上的改變：

題項有兩題，分別為 Likert 五點量表詢問可能程度的「請問您會不會因為吃美國牛肉有可能感染狂牛症，就不那麼常吃美國牛肉？」，受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訪者回答從「1=不會再吃」、「2=可能不會再吃」、「3=普通」、「4=可能會再吃」到「5=會再吃」；第二題為「請問您會不會擔心吃美國牛肉會得到狂牛症，而拒買美國牛肉？」，受訪者回答從「1=不會拒買」、「2=可能不會拒買」、「3=普通」、「4=可能會拒買」到「5=會拒買」。前者重新編碼反轉之後，與後者之主成分因素分析共可解釋72.62%的變異量，特徵值=1.45，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係數 r 為.452，達顯著相關。消費行為改變的建構方法是將這2個題項加起來除以2；得分越高表示消費行為改變程度越高（平均數=3.59，標準差=1.36）。

(5) 政治信任變項：

政治學者的研究中，對政治信任感的測量範圍，一般都以「政府」、「政府官員」為對象，詢問民眾是否認為「政府做的事都是正確的」、「政府官員會浪費老百姓繳納的稅金」以及「政府官員比較照顧自己的利益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至於信任的內涵，則可包括政策制定的能力、行政效能、值不值得民眾信任、操守以及是不是謀求一般民眾的福利等面向。但在本研究的公共衛生風險的脈絡下，政治信任涉及風險資訊，所以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的政治信任題項，即受訪者依照評估在美國牛肉事件中，以五點量表回答「政府提供給民眾有關美國牛肉相關的資訊很足夠」、「對台灣政府部門對美國牛肉的控管很信賴」，以及「您對台灣政府很信任」的同意程度，受訪者回答從「1=非常不同意」、「2=有些不同意」、「3=普通」、「4=有點同意」到「5=非常同意」。政治信任3題經主成分因素分析後，發現這3個題項呈一個因素，共可解釋75.54%的變異量，特徵值=2.27（見表二），信度檢測Cronbach's α =.84。建構政治信任程度的方法是將這3個題項加起來除以3；得分越高表示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平均數=3.55，標準差=1.18）。

表二：政治信任題項之主成分因素分析

題項	因素 政治信任
信不依賴台灣政府部門對美國牛肉的控管	.92
這次事件對台灣政府信不信任	.91
政府提供的訊息足夠程度	.76
特徵值 (Eigenvalue)	2.27
解釋變異量	75.54
Cronbach's α	.8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6) 對四個主要角色在美國牛肉事件中的信任程度。這些角色包括政府、媒體、學者專家與民間團體。請受訪者針對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媒體、政府以五點量表分別回答「在這次美國牛肉的事件當中，請問您對(機構)信不信任？」分數越高則信任程度越高。

(7) 知識變項本研究採用 Setbon、Raude、Fischler 和 Flahault (2005) 的關於狂牛症的七個是非題項，包括「狂牛症發生在人的身上，稱為賈庫式症，對不對？」、「賈庫式症的致命因子是普里昂變異蛋白」、「剛才說的變異蛋白是真頑強而且有感染性，對不對？」、「所有的人身上都有普里昂，對不對？」、「狂牛症可以感染到人類，對不對？」、「所有的賈庫式症不一定都與狂牛症有關，對不對？」、「所有的狂牛症都是在超過30個月大的動物身上發現的，對不對？」。狂牛症知識題的計算方式為加總計分。平均分數為2.88 (SD= 1.85；最高分為7分，最低分為0分)，答對1題到4題的受訪者百分比相距不遠，分別為18.3%、18.2%、17.4%以及16.2%；都沒答對者有9.2%，答對5題者有11.4%，答對6題者有6.2%，答對7題者有3.1%。

(8) 人口變項：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與其他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與政黨傾向，由於這些變項和民眾的社會認知與行為有關，因此本研究把它們列為控制變項。

結果

描述性統計

在媒介使用上方面，看報紙新聞的時間最多在16至30分鐘 (N=250，佔23.1%)，電視新聞最多在一小時以上 (N=324，佔30.0%)，網絡新聞最多是在16至30分鐘 (N=177，佔16.4%)。5上網搜尋相關資訊同意程度上，平均數為2.47 (SD=1.24)，常常和別人討論的同意程度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上，平均數為 2.80 (SD=1.25)，美國牛肉的新聞注意上，電視新聞注意程度最高 (Mean=3.31, SD=1.24)，其次為報紙 (Mean=3.07, SD=1.28)，再其次為網絡 (Mean=2.50, SD=1.26)。

當檢視民眾最常得到有關美國牛肉議題的資訊管道時，資料顯示受訪者認為最常得到資訊的管道第一為電視新聞 (N=769, 佔 73.3%)，第二為報紙新聞與網絡新聞並列 (N=118, 各佔 10.9%)，第四為與別人交談 (N=23, 佔 2.1%)，第五為廣播 (N=21, 佔 1.9%)，只有 1 位受訪者為雜誌。

研究問題一探討民眾在美國牛肉議題上對於各機構的信任程度，資料顯示在各角色的信任程度上，最被信任者是學者專家 (平均值=3.33, 標準差=1.19)，其次是民間團體 (平均值=3.27, 標準差=1.29)，第三為媒體 (平均值=2.57, 標準差=1.19)，信任度最低者為政府 (平均值=2.44, 標準差=1.34)。

迴歸分析

為了回答研究假設一以及研究問題二，關於個人特質、媒介暴露、媒介注意、政治信任，和對美國牛肉風險的知識、認知、態度與行為改變之關係為何，本研究進行數項迴歸分析。表三呈現迴歸分析的結果，其中第一階層輸入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第二階層輸入政黨支持，包括泛藍與泛綠；第三階層為政治信任程度；第四階層為人際交談；第五階層新聞暴露，包括看報紙新聞、電視新聞與網絡新聞的時間；第六階層為新聞注意程度，包括報紙新聞、電視新聞與網絡新聞的注意。

I. 人口學變項

在人口學變項上，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以狂牛症知識作為依變項時，人口學變項均不能預測知識。擔心程度上，女性較男性擔心 ($\beta=.09, p < .01$)、年齡越小越擔心 ($\beta=-.09, p < .05$)。教育程度越低，面對風險態度越謹慎 ($\beta=-.16, p < .001$)；在預測行為改變上，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性較男性較會改變消費牛肉習慣 ($\beta = .12, p < .001$)、年齡越小、教育程度越低者也越會改變習慣 ($p = -.09, p < .05$; $\beta = -.10, p < .05$)。

II. 政黨支持變項

在政黨支持變項上，對依變項的預測力均相當有限。

III. 政治信任

在政治信任上，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政治信任與知識無關，而與風險感知、態度與行為有關。政治信任程度越低，擔心程度越高 ($\beta = -.61, p < .001$)、風險態度越傾向謹慎 ($\beta = -.22, p < .001$)、越可能產生行為改變 ($\beta = -.47, p < .001$)。根據以上分析，研究假設一獲得支持。

IV. 人際交談

在人際交談上，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人際交談不能預測任何依變項。

V. 新聞媒介使用時間

在新聞媒介使用時間上，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看電視新聞時間正面預測狂牛症知識 ($\beta = .08, p < .05$)。新聞媒介使用時間多不能預測風險感知、態度與行為，唯一的例外是看電視時間會降低擔心程度 ($\beta = -.06, p < .05$)。

VI. 新聞注意

在新聞注意上，報紙新聞注意可以正面預測狂牛症知識 ($\beta = .12, p < .05$)，電視新聞注意正面預測擔心程度 ($\beta = .12, p < .01$)；報紙新聞注意正面預測行為改變 ($\beta = .10, p < .05$)。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表三：美國牛肉議題相關知識、風險態度與行為改變的階層迴歸分析

	狂牛症知識	擔心程度	風險態度	行為改變
預測變項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 (男=0, 女=1)	-.03	.09***	-.01	.12***
年齡	.00	-.09**	-.09!	-.09*
教育程度	.07	-.02	-.16***	-.10*
婚姻狀態				
(已婚=1, 未婚=0)	-.01	-.03	.00	.00
Adjusted R2	.01	.01	.02	.02
第二階層				
政黨支持				
泛藍	.05	-.04	-.04	-.04
泛綠	.01	.01	-.07	.02
Adjusted R2 增加	.00	.12	.01	.07
第三階層				
政治信任	-.04	-.61***	-.22***	-.47***
Adjusted R2 增加	.00	.32	.04	.18
第四階層				
人際交談	.07	.06	.01	-.02
Adjusted R2 增加	.03	.01	.00	.00
第五階層				
媒介新聞使用時間				
看報紙新聞時間	.02	-.02	.00	-.02
看電視新聞時間	.08*	-.06*	-.02	-.05
上網看新聞時間	.07!	-.05	-.08!	-.05
Adjusted R2 增加	.01	.00	.00	.00
第六階層				
媒介新聞注意				
報紙新聞注意	.12*	.02	-.03	.10*
電視新聞注意	.01	.12**	-.05	-.02
網絡新聞注意	.08!	.03	.07	.04
Adjusted R2 增加	.02	.01	.00	.01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06	.47	.06	.27

註：表格中之係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結論與討論

人們對於風險的感知常基於三個來源：親身經驗、人際傳播，以及間接的社會聯繫 (Singer & Endreny, 1993 : 2)。所謂的間接的社會聯繫所指即為大眾媒體，尤其是指新聞。本研究發現民眾最常得到有關美國牛肉議題的資訊管道依序是電視新聞、報紙新聞與網絡新聞、與別人交談、廣播。其中超過七成的民眾認為電視新聞是主要管道，可見電視新聞在風險傳播的重要性，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電視新聞是否為作為理解風險的最適當管道，例如是否資訊呈現缺乏脈絡，使得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眾無法正確理解風險而過度擔心。另外，網絡新聞已與傳統報紙的重要性並駕齊驅。相較於媒體，以人際傳播作為風險資訊管道的民眾較為有限。

在民眾個人特質與風險知識、認知、態度與行為的關係上，迴歸分析顯示女性較男性擔心美國牛肉風險的發現也與國外研究發現一致 (Setbon, et al., 2005)。一般而言，對於食物的風險擔心程度以女性較高 (Breakwell, 2000)。

在政治信任上，政治信任程度越低，擔心程度越高、風險態度越傾向謹慎、越可能產生行為改變。要達到有效的風險傳播，但公眾對於有關單位缺乏信任，則無法面對風險產生正向的態度與行為，我們發現在美國牛肉進口議題上，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於個人風險反應影響相當大。在此次風險議題中，社會各機構之間的不信任是爭議來源。本研究也發現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遠低於學者專家、民間機構以及媒體。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導因於開放進口的決策時機爆發點過於突然，在缺乏社會共識之下，予人一種台灣政府罔顧民眾健康與權益，與美國政府之間逕自進行檯面下交易的想像，儘管行政院以及相關衛生部門一再解釋開放進口部位以及三管五卡措施，政治信任的破滅使得往後的溝通顯得困難。政治信任度越低者，決策者對公眾關注的焦點仍需要有一定敏感度。公眾關注源自於認知和情感的社會心理過程。所以政府與相關機構在進行風險溝通評估時，應該了解是哪些因素形塑了大眾對風險議題的觀點與態度，有助於相關部門精進有效的風險議題宣導上，該如何敘述風險。

在新聞媒介使用時間方面，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有助於狂牛症知識增加。新聞媒介使用時間多不能預測風險感知、態度與行為。在新聞注意上，與過去媒介效果的結論相去不遠，本研究發現越是注意報紙新聞，狂牛症知識越多；越是注意電視新聞，則越是擔心。Eveland (2003) 指出，報紙是文本型 (textuality) 媒介，而電視是線性 (linear) 媒介，且如 Iyengar (1991) 所指出，電視新聞多以個別事件框架 (episodic frame) 描述議題。前者較後者使閱聽人有機會仔細反芻，後者會使得觀眾花費較少的心智努力。因此報紙有利於讀者的資訊處理，越是注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意報紙新聞則知識越豐富。而電視由於敘事手法上採取個人故事的角度，因此閱聽人對於風險的理解不同於報紙讀者，越是注意電視新聞讓觀眾越加擔心。

本研究也發現越是注意報紙相關新聞，越會有牛肉消費上的行為改變。研究者認為報紙新聞探討風險議題時，多着重於風險的本質以及議題之情境，少以個人層次角度描述風險，因此閱聽人在進行資訊處理時，較少以個人風險 (personal risk) 評估，而多以社會風險 (societal risk) 評估，因此認為牛肉有潛在風險，而改變消費牛肉習慣。

媒介暴露時間長短與政治知識的正面關係在政治傳播領域已被充分檢驗(陳憶寧，出版中)，然而報紙與電視兩大主要媒體的注意程度和民眾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卻常常視情況而異。媒介有守望與整合資訊的功能，政治新聞不但可以幫助大眾了解重要社會事務，也可使大眾較關心社會，因而較可能投入、參與社會事務。換成高度不確定，且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狂牛症風險議題，則越是注意媒體上的新聞，擔心越多，甚至改變消費行為。

從歷史來看，新聞在現代民主的過程中具有三項任務：第一，提供完整、可信賴的以及公正的有關社會大眾的訊息；第二，組織開放的場域讓民眾發聲且進行辯論，表達其焦慮以及關懷；第三，扮演「看門狗」的角色，監督企業及政府的權力行使 (Hughes, Kitzinger, & Murdock, 2006: 250)。在美國牛肉風險議題中，民眾在了解包括狂牛症相關訊息、政府的立法與防範措施，以及社會各界的討論，媒體是重要的管道，不僅讓公眾知曉美國牛肉中潛藏的狂牛症風險，媒體提供大眾風險資訊的同時，也影響了民眾面對風險的感知，提升了擔憂，也改變消費行為。

Sandman (1993) 指出風險傳播有兩個面向，一是為了警示大眾，二是使大眾冷靜，照理說媒體一方面是告知大眾注意風險，一方面應該是讓大眾不必過度恐慌，然而根據本研究顯示，媒介的確警示，但卻沒有降低大眾的擔心。尤其是新聞作為最主要的資訊管道，使得民眾擔心更深。不過，也不能否認，新聞功能的彰顯有時也使得社會在科技與科學高度發展下，更加關注環境與人類健康的議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此次風險議題中媒體表現如何，因本研究缺乏新聞內容資料，因此難以評斷。不過，在風險議題中，苛責媒體不能完全解決新聞表現是否妥當的問題，還有許多的因素影響到媒體報導的內容。截稿壓力與記者所擁有的資源多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Tuchman, 1978; Shook & Lattimore, 1987)。另外更不可忽視的是記者所接觸到的消息來源(Gans, 1979)，Gans認為不同的消息來源會將記者的報導引導成完全不同的方向。Gandy(1982)以經濟學的角度解釋消息來源與記者的關係，記者有截稿壓力，所以哪個消息來源最能幫助他完成工作，就越可能成為消息來源。醫學與科學報導通常牽涉到專精的知識，平日記者難有機會進修或吸收最新風險資訊；所以記者更依賴消息來源，如此可以推論，消息來源的特質可以決定了記者的採訪。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現代媒體不可避免朝商業傾斜(McManus, 1990)，如果衝突與戲劇化的程度不夠高，難以成為新聞。如此情況下，越看電視新聞越擔心的研究發現相當合理。媒體雖以量的角度而言，告知了民眾有此風險事件，但卻可能沒有提供減低大眾恐慌的質的資訊。

本研究在電話調查部分成功率稍低，為21.3%，雖然美國牛肉議題當時正熱，對於民眾而言，回應應該無太大困難，但其中知識題難度偏高，可能影響受訪者回答意願。另外，此次問卷長度達37題，較一般電訪的30題要多，可能影響了成功回覆率，未來研究仍應考慮題項數目以及題目難度。

本研究最重要的限制在於缺乏新聞內容資料，因此無法針對風險的媒體呈現進行分析，以確認風險新聞是否妥適敘述風險議題。另外，本研究資料來自某一個時間之內的橫斷面調查，無法明確界定媒體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因果關係。但過去四十多年的傳播文獻已顯示媒介可影響到個人認知、態度、意見與行為，且在缺乏過去親身經驗的風險議題上，媒體使用的效果應該更可確定。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註釋

1. 例如台灣庫賈氏症權威陳順勝要求政府公佈完整談判內容及未來進口細節，並建議應增列美國農業部「不實資料」協定，若發現美方提供評估資料或屠宰證明不實，台灣有權立刻停止牛肉進口（《聯合報》，2009年10月26日）。台大獸醫學系教授賴秀穗表示牛肉衛生安全方面可能不是問題，而是政府決策應該透明公開，並採漸進式，待美國狂牛病疫情更明確再考慮開放，但不應開放內臟等高危險區域（《自由時報》，2009年10月30日）。前環保署長陳重信擔心衛生署全面放寬狂牛病疫區的美國帶骨牛肉、內臟、絞肉等風險產品進口，若進入廚餘回收系統，恐怕會造成全球首例狂豬症的病豬。台大公衛學院吳焜裕教授所做的「美國帶骨牛肉 風險評估報告」顯示，牛絞肉導致狂牛症的風險最高，因為裏頭可能混雜牛神經，如果每天吃得到，狂牛症機率高出720倍，此外，98%國人帶有的人類狂牛症易感受基因的比例，是歐美國家的2倍（《東森新聞》，2009年10月24日）。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所長劉宗榮表示，根據國外報告，狂牛症牛隻多是老牛，衛生署開放30月齡以下的美國牛隻進口，從學理和經驗來看應較無問題，但應該更多科學根據告訴民眾為何要開放牛內臟和脊髓。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憂心，導致狂牛症的毒蛋白非常難以檢驗，政府如何保證不會在檢驗有疏漏？以過去經驗，通常政府檢驗報告出來，消費者都已經吃下肚了，尤其內臟容易混雜腦脊髓與神經，風險也比一般肉類大（《自由時報》，2009年6月27日）。
2. 民調執行日期為2009年10月27至28日，訪問對象為20歲以上具有投票權公民。抽樣方式為電話尾數二碼隨機，總共完成901份問卷。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 $\pm 3.3\%$ 。
3. 例如初期宣佈進口帶骨牛肉政策時，總統馬英九被問到吃不吃美國帶骨牛肉時，僅以「謝謝」帶過，並未回應他是否願意吃美國帶骨牛肉。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表示，行政院長吳敦義已表明不會進口脊髓部分，至於絞肉與內臟部分，政府會做好嚴格把關工作，同時相信消費者有足夠的智慧，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食用相關進口食品。宣佈開放兩個月後，立法院對近十年內發生過狂牛症病例地區牛隻製品的進口設限，包括內臟、絞肉、脊髓等部分禁止進口台灣，發言人王郁琦表示，總統府對立法院修法表示尊重，對於修法過後，30個月齡安全無虞的帶骨牛肉可開放進口表示支持。不過，馬英九也指示行政部門應盡速組團向美方說明、考察，趕快把傷害控制到最小，避免對台美關係的衝擊（中央社，2009年12月30日）。官員方面，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在立法院答詢表示，美國30月齡以下的帶骨牛肉進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7期(2011)

- 來台灣，他自己敢吃，家人也敢吃，但「並不鼓勵國人吃！」陳武雄此話一出，引起現場嘩然(《聯合報》，2009年10月26日)。衛生署長楊志良被批評簽訂美牛進口條約是「喪權辱國」，他表示絕對不接受這樣的說法，楊志良還對參與談判的衛生署、經濟部及農委會官員表示「高度肯定」。他說：「美國有三億人口，這麼大的國家還委屈地跟台灣談判這麼久。」話鋒一轉，甚至說：「他們吃老牛、台灣吃嫩牛，台灣還挑三揀四、挑肥揀瘦，美國養殖業者一定認為美國農業部喪權辱國。」(《聯合報》，2009年10月26日)。
4. 民調執行日期為2010年1月4日，訪問對象為20歲以上民眾。抽樣方式為電話尾數四碼隨機，總共完成881份問卷。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 $\pm 3.3\%$ 。
 5. 此處計算扣除各類新聞「幾乎不看」選項。報紙與網絡新聞最多選項都是幾乎不看，前者有336人(佔31.1%)，後者有642人(佔59.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TVBS民意調查中心(2009年1月4日)。〈美國牛進口修法民調〉。上網日期：2010年1月25日，取自http://www.gclub.com.tw/news/poll_center/index.html
- TVBS minyi diaocha zhongxin. (2009, April 1) Meiguo niu jinkou xiufa mindiao. Retrieved January 25, 2010, from http://www.gclub.com.tw/news/poll_center/index.html
- 民主進步黨。開放美國牛肉進口議題民調。取自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menu_sn=7&sub_menu=43&sn=4068
- Minzhu jinbudang. Kaifang meiguo niurou jinkou yiti mindiao. Retrieved October 29, 2009 from 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menu_sn=7&sub_menu=43&sn=4068
- 陳憶寧(出版中)。〈告知與動員：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張茂桂、徐火炎、羅文輝主編《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政治行為與傳播行為篇，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中央研究院籌劃中。
- Chen yining. (forthcoming). Gaozhi yu dongyuan: xinwen meiti shiyong, zhengzhi zhishi yu zhengzhi canyu de guanxi. Zhang maogui, Xu huoyan & Luo wenhui (Eds.). *Taiwan de shehui bianqian 1985–2005: zhengzhi xingwei yu chuanbo xingwei pian, taiwan shehui bianqian jiben diaocha xilie san*. Zhongyang yanjiuyuan chouhua zhong.
- 顧忠華(2003)。〈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治理：SARS事件的啟示〉。《當代》，第194期，頁54–61。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 Gu zhonghua. (2003). Fengxian shehui zhong de fengxian zhili: SARS shijian de qishi. *Dangdai*, No. 19, pp. 54–61.
- 顧忠華 (2001)。〈風險、社會與倫理〉。顧忠華 (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頁17–45)。台北：巨流。
- Gu zhonghua. (2001). Fengxian shehui yu lunli. Guzhonghua (Ed.), *Di'er xiandai: fengxian shehui de chulu?* (pp. 17–45). Taipei: juliu.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ndersson, L. M. (1996). Employee cynicism: An examination using a contract violation framework. *Human Relations*, 49 (11), 1395–1418.
- Beck, U.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Bennett, S. E., Rhine, S. L., Flickinger, R. S., & L. L. M. Bennett. (1999). Video-malaise' revisited: Public trust in the media and government.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4(3), 8–23.
- Berkowitz, D. (1987). TV news sources and news channels: A study in agenda build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4, 508–13.
- Berry, T R., Higgins, J., & Naylor, P. J. (2007). SARS wars: An examination of the quantity and construc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in the news media. *Health Communication*, 21(1), 35–44.
- Breakwell, G. M. (2000). Risk communication: Factors affecting impact.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56(1), 110–120.
- Brookes, R. (1996) Newspaper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BSE/CJD crisis and the British pres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1(2), 247–263.
- Bryanty, J. & Zillmann, D. (Eds.). (2002).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Mahwah, NJ: LEA.
- Cappella, J. N., & Jamieson, K. H.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S. H. (1986).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hannels: Competitive, convergence or complementary? In G. Gumpert & R. Cathcart (Eds.), *Intermedi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 media world* (pp. 62–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trin, J., & Muste, C. (1999). Trust in government.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pp. 465–532). CA: San Diego Press.
- Coleman, C. L. (1993). Th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society and personal risk judgmen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 611–628.
- Combs, B., & Slovic, P. (1979). Newspaper coverage of causes of death. *Journalism Quarterly*, 56(4), 837–843.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17 期 (2011)

- Cook, K. S. & Cooper, R. M. (2001).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ooperation, trust, and social exchange. In E. Ostrom &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Vol. 6* (pp. 209–24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orbett, J. B., & Mori, M. (1999). Medicine, media, and celebrities: News coverage of breast cancer, 1960–1995.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6(2), 229–49.
- Chanley, Virginia A. (2002).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9/11: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3(3), 469–83.
- Dennis, J., & Webster, C. (1975). Childrens' images of the president and of government in 1962 and 1974.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3 (4), 386–405.
- Dudo, A.D., Dahlstrom, M.F., & Brossard, D. (2007). Reporting a potential pandemic: A risk-related assessment of Avian Influenza coverage in U.S. newspaper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8(4), 429–454.
- Dunwoody, S., & Neuwirth, K. (1991).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 judgements. In L. Wilkins & P. Patterson (Eds.), *Risk business: Communicating issues of science, risk, and public policy* (pp. 1–30). New York: Greenwood.
- Dunwoody, S., & Ryan, M. (1985). Scientific barrier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mass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1), 26–42.
- Eveland, W. P. Jr. (2003). A “mix of attribute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effect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395–410.
- Fischhoff, B., Slovic, P., & Lichtenstein, S. (1978).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 *Policy Science*, 9, 127–152.
- Fischhoff, B., Bostrom, A., & Quardrel, M. J. (1997).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R. Detels, J. McEwen, & G. Omenn (Eds.), *Oxford Textbook of Public Health* (pp. 987–10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Fischhoff, B. (1998). Communicate unto others.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afety*, 59, 63–72.
- Frost, K., Frank, E., & Maibach, E. (1997). Relative risk in the news media: A quantification of misre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5), 842–845.
- Gandy, O. H.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lbex.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Greenberg, M. R., Sachsman, D. B., Sandman P. M., & Salomone, K. L. (1989).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environment risks. *Environment*, 31(2), 40–44.
- Greenberg, M. R., Sachsman, D. B., Sandman P. M., & Salomone, K. L. (1989). Risk, drama, and geography in coverage of environmental risk by network TV. *Journalism Quarterly*, 66(2), 267–276.
- Greenberg, M. R., Sachsman, D. B., Sandman P. M., & Salomone, K. L. (1989). Network evening news coverage of environmental risk. *Risk Analysis*, 9(1), 119–126.
- Hansson, S. O. (2002). Uncertainties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4(17), 39–46.
- Hardin, R. (2001). Gaming trust. In E. Ostrom &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Vol. 6 (pp. 80–10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arvey J., Erdos G., Challinor S., Drew S., Taylor S., Ash R., Ward S., Gibson C., Scarr C., Dixon F., Hinde A., & Moffat, C. (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erceived consumption of meats and other proteins in relation to the BSE crisis: A regional stud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ealth, Risk and Society*, 3(2), 181–197.
- Hughes, E., Kitinger, J., & Murdock, G. (2006). The media and risk. In P. Taylor-gooby & J. Zinn (Eds.), *Risk in Social Science* (pp. 250–2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yengar, S. (1991).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sperson, R. E., Jhaveri N., & Kasperson, J. X. (2001). Stigma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owar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J. Flynn, P. Slovic, & K. Kunreuther (Eds.), *Risk, media and stigma: Understanding public challenges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p. 9–27). London: Earthscan.
- Kizinger, J., & Reilly, J. (1997). Media coverage of human genetics research, ‘False Memory Syndrome’ and ‘Mad Cow Diseas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319–350.
- Krewski, D., Somers E., & Birkwood, P. (1987). Risk perception in a decision making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5, 175–209.
- Krewski, D. (1993). Heath risk perception. *Comments on Toxicol*, 4, 519–524.
- Lenart, S. (1994). *Shaping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ews. R. E., & Tyshenko, M. G. (2009). The impact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and the public reaction to mad cow disease in Canada. *Risk Analysis*, 29 (5), 714–728.
- Lichtenberg, J. & MacLean, D. (1991).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 In R. E. Kasperson & P. J. M. Stallen (Eds.), *Communication risks to the public*.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oewenstein, G. F., Weber, E. U., Hsee, C. K., & Welch, E. (2001). 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 267–286.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17 期 (2011)

- Macintyre, S., Reilly, J., Meller, D., & Eldridge, J. (1998). Food choice, food scares, and health: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A. Murcott (Ed.), *The Nation's diet: The social science of food choice* (pp. 228–249). Harlow: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Mazur, A., & Hall, G. S. (1990). Effects of social influence and measure of exposure level of response to Radon. *Sociological Inquiry*, 60(3), 274–84.
- McComas, K. A. (2006). Defining moments in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2005.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1), 75–91.
- McManus, J. (1990). How local television news learns what is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7, 672–83.
- McIntosh, W. A., Christensen, L. B., & Acuff, G. R. (1994). Perceptions of risks of eating undercooked meat and willingness to change cooking practices. *Appetite*, 22, 83–96.
- Mcknight, D. H., Cummings, L. L., & Chervany, N. L. (1998). Initial trust formation in new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3), 473–490.
- Morton, T. A. & Duck, J. M. (2001).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beliefs – mass and interpersonal influences on perceptions of risk to self and othe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5), 602–626.
- Neuwirth, K., Dunwoody, S., & Griffin, R. J. (2000).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Risk Analysis*, 20(5), 721–734.
- Reilly, J. (1999). “Just another food scare?”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the BSE crisis. In G. Philo (Ed.), *Message received: Glasgow media group research 1993–1998* (pp. 128–145). Harlow: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Rokeach, S. J. B., & Defleur, M. L. (1976).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 3–21.
- Rotter, J. B. (1971).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443–450.
- Rowe, G., Frewer, L., & Sjoberg, L. (2000). Newspaper reporting of hazards in the UK and Swede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9(1), 59–78.
- Sandman P. M. (1993). *Responding to community outrage: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Fairfax, VA: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 Sandman, P. M., Sachsman, D. B., Greenberg, M. R., & Gochfeld, M. (1987). *Environmental risk and the press: An exploratory assessme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Inc., Rutgers University.
- Scholz, J. T., & Lubell, M. (1998). Adaptive political attitudes: duty, trust and fear as monitors of tax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398–417.
- Setbon, M., Raude, J., Fischler, C., & Flahault, A. (2005). Risk perception of the Mad Cow Disease in Franc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Risk Analysis*, 25(4), 813–826.
- Singer, E. & Endreny, P. (1987). Reporting hazards: Their benefits and cos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3), 10–26.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

- Shook, F., & Lattimore, D. (1987). *The broadcast news process*. Englewood, Colorado: Morton.
- Scholz, J. T., & Lubell, M. (1998). Trust and taxpaying: testing the heurist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903–920.
- Slovic, P. (1999). Trust, emotion, sex, politics, and science: 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 *Risk Analysis*, 19, 689–701.
- Slovic, P., Finucane, M., Peters, E., & MacGregor, D. G. (2002). The affect heuristic. In T. Gilovich, D. Griffin, & D. Kahneman (Eds.),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 (pp. 397–4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ovic, P., & Weber E.U. (2002). Perception of risk posed by extreme event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f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n Uncertain World, Palisades, New York.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Verbeke, W., Viaene, J., & Guiot, O. (1999).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on meat in Belgium: From BSE until dioxi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4(4), 345–357.
- Verbeke and Viaene, (1999). Beliefs, attitude and behaviour towards fresh meat consumption in Belgiu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consumer survey. *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 10(6), 437–445.
- Verbeke, W. (2001). Beliefs, attitude and behavior towards fresh meat revisited after the Belgian dioxin crisis. *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 12(8), 489–498.
- Wilson, K., Code, C., Dornan, C., Ahmad, N., Hebert, P., & Graham, I. (2004). The reporting of theoretical health risks by the media: Canadian newspapers reporting of potential blood transmission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BioMed Central Public Health*, (4), 1.
- Yamagishi, T., & Yamagishi, M.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 (2), 129166.

本文引用格式

陳憶寧 (2011)。〈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17 期，頁 31–60。